
蘇聯青年何處去？

謝天士

就一個政府而言，青年是國家寶貴的人力資源。如何開發和運用這個人力資源是政府所關切的問題。就青年本身而言，則他們有自己的價值觀念和期望。蘇聯是個在文化上由政府主宰的社會，政府想塑造青年，而不是讓他們自然地發展他們的人格。本文擬從蘇聯青年^①對政治的態度及對個人幸福的追求的傾向來看蘇聯青年問題，並從思想和現實意義上，看這些問題對蘇聯社會的影響。

一、蘇聯青年的心態

1. 對政治冷漠

差不多所有西方的蘇聯事務觀察家都注意到，蘇聯青年缺乏對政治和意識形態的興趣。曾於一九二九到一九五九年間訪問蘇聯十三次，前後在蘇聯住了六年之久並遊歷各地的德國人梅那（Klaus Mehnert），於一九五〇年代末期重返蘇聯時，發現了一些顯著的變化。當他於一九三〇年代在蘇聯時，任何一種談話都很容易轉變為政治討論，但在五十年代末，這種現象很少出現。尤其是年輕人態度的改變最為明顯。他們談論中學、大學、老師、朋友、個人野心、工作和賺多少錢等，但對政治則無一言。偶而有人談起政治問題，那準是「職業」政客，例如共青團的官員^②。雖然大部份蘇聯青年皆為共青團的團員，但這並不能說明他們一定熱衷政治和意識形態。首先，我們必須注意到一個事實，即共青團是蘇聯境內僅有的青年組織。青年一般都喜歡團體生活，加入共青團是他們惟一的選擇。入共青團後，他們才能享有更多參加休閒活動的機會，例如跳舞、運動和旅遊等。另外，有些人則是受到一批共青團積極分子的包圍，要求他們加入，如果他們拒絕，那是很不智的舉動。

共青團本來就是共黨的胳膊，共黨常常發動共青團的人力去支援新的建設計劃，例如開發處女地和興建貝加爾湖至黑龍江的

註①

筆者所引用之資料，大多討論六十年代的蘇聯青年。但從蘇聯官方的批評看，可知今天的蘇聯青年與過去仍有許多共同之點。而少數民族青年是個必須分開討論的問題，因此本文亦不考慮這個因素。

註②

Klaus Mehnert, *Soviet Man and His World*, (New York: Praeger, 1961), p. 224.

蘇聯青年何處去？

鐵路等。這並不是大多數團員的志趣所在。因此，事實上，共青團早就分裂成兩個階層。在上層的是黨工人員所組成的機關組織，在下層的是一般的團員。而在下層的這批大多數團員是無意接受共青團「積極分子」的壓制和灌輸的^⑤。

美國的陶曼博士（William Taubman）曾獲得傅爾布萊特——海斯獎學金，在美蘇學術交流計劃的贊助下，於一九六五——六六學年度到莫斯科大學法學院進修一年。當地同學曾問他在美國唸的有那些課程。當他提到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時，那些俄羅斯同學都很驚訝，因為他們都是儘量逃避這個課程並且藐視蘇共黨史這門課^⑥。

青年對政治冷漠有幾個原因：(1)受生長的時代背景的影響。大部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生出的青年，對革命的認識只是從歷史課本上得來。十一月七日和五月一日等革命的日子對他們而言，只是不必去工作的日子，不再具有政治鬥爭的意義^⑦。(2)童年受官方宣傳的影響，對未來充滿着憧憬，長大後面對的是另一種現實，認識這兩種畫面的對照，不可避免地導致他們對政治冷漠，最後則變成犬儒主義者^⑧。許多知識青年感覺黨經常向他們隱瞞重要消息，因此向別的消息來源找答案，例如收聽英國廣播公司和美國之音的廣播^⑨。(3)除了對共青團和類似組織的官員之外，政治（無論是活動或思想）對青年都沒有太大的實質意義或影響。專業知識才是他們在社會爬升的憑藉。把精力用在升學和吸收專業知識都惟恐不及，遑論談論政治或搞政治活動。萬一出了紕漏，連升學之路都堵住了。循政治途徑爬升並不見得吸引人，有時還可能捲入權力鬥爭的漩渦中。作爲一個專業人員同樣能享受物質利益，對一般青年是更可行的道路。像卡加林少校（Major Gagarin）於一九六〇年的入黨，只不過是在他做了歷史性太空飛行之前不久的事。而製造蘇聯人造衛星的設計師和技術人員，又有幾個是熱心的共產黨員呢^⑩？

2. 物質主義

六十年代以後的蘇聯青年普遍對物質幸福的追求，比上一代強烈。幾乎所有訪問過蘇聯的外國學者都這樣報導，蘇聯的消息來源也證實這點。六十年代是蘇聯社會學有具體發展的時期，當時的社會學研究包括意見和態度的調查，是了解青年價值觀念的寶貴資料來源。稍早，有關青年志向的問卷，提出的問題大都受意識形態的左右，例如「幫助建設共產主義」、「爲祖國服務」或「贏得集體的讚揚」等。後來的調查便比較不沾染意識形態的偏見，比較能反應青年的真正態度。

註③ A. I. Lebed, ed., *Youth in Ferment*, (Munich: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the U.S.S.R. 1962), pp. 81-2.

註④ 轉引自 Routh W. Moully, "Values and Aspirations of Soviet Youth," in Poul Cocks, et al., eds., *The Dynamics of Soviet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233.

註⑤ 同註③。

註⑥ 同註③，p. 222.

註⑦ 同註③，pp. 235-6.

註⑧ 同註③，p. 225.

一九六六年兩位蘇聯學者在列寧格勒對二千二百零四人所作的有關青年短期志願的研究，很有參考價值（見表一）^①。其中百分之五十五的应答者，選擇「獲得物質幸福」作為主要的志願。而且，最多应答者所選擇的前三項，都與物質幸福有關。可以看出來，青年嚮往的工作不但是有趣的和享受的，而且是要賺錢多的，而接受高等教育便是獲得這類工作的台階。到國外旅行更非一般公民的財力所能負擔^②。而出入蘇聯國境也不是輕而易舉的事。至於希望有好的房子和汽車（對蘇聯公民而言是奢侈品）等，都是承認對物質幸福的追求。只有少數人表示願意到新的建設地點去工作。甚至有的青年願意參與新的建設計劃，為的是有較多的津貼可領，多賺點錢，將來回來後生活可獲得改善。蘇聯報紙上的文章失望地透露過，某些青年志願到哈薩克斯坦的田裏度過一個暑假或更長時間，或到西伯利亞開發，是基於物質的理由，而非基於參與國家建設的無私的願望。美國學者史瓦茲（

表一：青年短期志願

志願順序	選擇人數	佔回答人數的百分比
1. 得到一份有趣而享受的工作	1,339	60.6
2. 受高等教育	1,316	59.7
3. 訪問其他國家	1,269	57.5
4. 獲得物質幸福	1,209	54.9
5. 得到良好的住宅	1,202	54.6
6. 得到就業資格	965	43.7
7. 找到真正的朋友	951	43.2
8. 教養子女成為好人	921	41.8
9. 找到真正的愛情	916	41.5
10. 結婚	705	32.0
11. 擁有一部汽車	693	31.4
12. 受中等教育	487	22.0
13. 成為建築工人	405	18.4
14. 其他	148	6.7

選擇的項目不受限制

註① Zev Katz, "Sociology in the Soviet Union," *Problems of Communism*, 20 (May-June 1971), p. 36.
註② 同註①, p. 222.

Joel Schwartz) 在莫斯科也遇到表示同樣動機的學生。他描述說：「有一次有位熟人利用夏天到『處女地』工作，不介意他所要忍受的辛苦。他說：『畢竟，我回到莫斯科之後，會有足夠的錢買一套新西裝和唱機。』另一位熟人告訴我，他已請求分配工作的單位將他派往『極北』。他承認，在那裏生活會很苦，但是他又說：『我可以拿到雙倍的報酬。賺來的工資在那裏沒地方花。因此，我希望當我三年的義務到期時，會有足夠的錢來買一部汽車』^⑩。這些事實都表示蘇聯青年對物質的期望的增高。

青年對物質的期望和對好的工作的企求，多少是父母教養下的產物。多少次父母灌輸孩子體力勞動的可怕，鼓勵他們進好的大學，告訴他們要有好的生活就要找到令人尊敬和待遇好的職業^⑪。換言之，要想辦法脫離體力勞動的、無技術的或低度技術的工人和農民這兩個階級，成爲具有中等專科以上教育的專家——中間階級。蘇聯社會的現實本身便是這種現象最好的鼓勵。自一九三〇年代以來，中間階級是維繫蘇聯社會的一股力量。靠他們，蘇聯當局才能退阻因集體化和工業化而導致的社會解體。因此，他們享有一些特權和較高的報酬^⑫。基於這種現實，青年很自然地努力躋身中間階級並謀求個人的福利。

3. 厭惡下鄉

照規定，蘇聯大學生畢業之後，有義務接受分發，到迫切需要人的崗位服務三年，以償還他們所享受過的免費教育。通常他們會被分發到最偏僻和低度開發等最難找到志願者的地方。教育學院的畢業生憂慮被派到西伯利亞和遠東鄉下地區的學校任教，便是個明顯的例子^⑬。有些人爲了逃避這種分發，便在大都市工作、獲得居留許可的人結婚，但當他因此獲准留在大都市并等找到工作後，便辦理離婚。有的人則以健康不佳或家庭需要依靠他們爲由推脫。最普通的方法則是巴結有影響力的人士或組織，向分發工作的單位施壓力，以便派到大都市的工作崗位^⑭。被分發到農村地區的青年不是設法回到城市便是等三年義務盡了之後，離開農村。農村本地的青年也是大量移往城市。一九五九至一九七〇年間，平均每年有一百五十萬農村居民移到城市，隨後又增加到每年一百九十萬人^⑮。這批人的絕大多數是十五歲到三十五歲的人，其中又以十多歲和二十多歲的青年居多^⑯。產生上述現象的最主要原因是，農村生活太苦，一般居住、文化與物質條件都很差，以致青年視爲畏途。

註⑬ *Ibid.*, p. 223.

註⑭ *Ibid.*, p. 237.

註⑮ John Bushnell, "The New Soviet Man Turns Pessimist," *Survey*, 24 (Spring 1979), p. 17.

註⑯ David E. Powell, "The Rural Exodus," *Problems of Communism*, 23 (November-December 1974), p. 6.

註⑰ *Ibid.*, p. 1.

註⑱ *Ibid.*, p. 1.

註⑲ *Ibid.*, p. 2.

二、蘇聯政府的煩惱

1. 意識形態層面

自蘇維埃政權成立之初，它就期望它統治下的人民具有「多方面發展的人格」。對青年的期望更是如此。一九六一年十月蘇共第二十二次大會通過的黨綱中，正式列入「新人」的概念，想把蘇聯人民訓練成融合高度智慧，道德完整和健全身體的新人。布里茲涅夫在蘇共二十四大重新強調這個原則。他說，塑造新人，在未來應像過去一樣，構成黨建設共產主義的主要工作^⑬。最近，布里茲涅夫在蘇共二十六次，再度提到「新蘇維埃人」是忠誠的勞動者、高度政治文化的人、愛國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他是由黨、國家英雄史和我國一切制度所教育出來的。他是一個生氣勃勃的新世界創造者^⑭。

從意識形態的層面來看，蘇聯政府的確關切青年思想的純正與承諾。年輕一代比上一代更不關心政治，便表示蘇聯教育體系甚至整個制度的徹底失敗，就會引起有關人員的關切和批評。這種批評往往都連帶責怪西方資產階級的宣傳。例如前俄羅斯共和國聯盟黨部的宣傳鼓動部（Agitation and Propaganda Department）部長哈利吉耶夫（M. Khaldiyev）曾表示：應該「教育年輕一代如何吸收和延續老一代的革命傳統」；「忽略青年思想教育工作的缺點是錯誤的」；「不應低估資產階級思想家使蘇聯青年解除思想武裝、動搖他們對共產主義理想的信念並灌輸消極和政治冷漠的努力」^⑮。最近倫敦「泰晤士報」報導，蘇聯秘密警察副頭目契布里科夫（Victor Chebrikov）在一篇為年輕的黨積極分子所寫的文章中，指責西方藉宗教、資本主義思想和西方生活方式來腐化蘇聯青年，使他們「對政治冷漠」並鼓勵他們孤立和反叛^⑯。

2. 政治意識層面

另一方面，假如青年不但關心政治，而且對政治事務洞察敏銳，理想主義式地想回到以往的革命純真；或者青年對現存制度不滿而加入「民主運動」；那麼他們反而會給目前保守的蘇聯政權帶來煩惱。事實上，學生團體中這一類的人很少。根據雷德威（Peter Reddaway）的大略估計，民主運動中的成員以在學術團體中的最多，約有三分之一；其次是作家、藝術家或演員，約

註^⑬ *The Soviet Union 1976-77: Domestic, Economic, and Foreign Policy*, Vol. 4, (New York: Homes & Meier Publishers, Inc., 1976), pp. 35-6.

註^⑭ *Pravda*, February 24, 1981.

註^⑮ M. Khaldiyev, "Rear Young People in the Spirit of Revolutionary Ideals," *Pravda*, November 28, 1965.

註^⑯ *The Times* (London), June 9, 1981, p. 12.

佔四分之一；八分之一的成員是工程師或技術員；成員最少的是工人和學生，各佔約二十分之一^②。儘管學生參加民主運動的人很少，但是克里姆林宮對這種傾向的憎惡程度必然高於對青年的政治冷漠。從現實的觀點來看，青年對政治冷漠對蘇聯政權有利而無害，青年對高等教育和專業知識的追求，對國家的科技發展和生產活動也是有利的。因此，儘管蘇聯當局對青年的政治冷漠時有批評，也許我們對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不應誇張。畢竟蘇聯領導人比任何局外人更明白，青年不積極的參與，對目前政治體系的穩定與維持，更為有利^③。

3. 教育層面

隨着蘇聯社會的工業化，蘇聯高等和中等專科學校有增加的趨勢。例如一九六〇——六一年間高等和中等專科學校分別有七百三十九和三千三百二十九所，到一九七二——七三年分別增加到八百二十五所和四千二百七十所。但入學的競爭仍然非常激烈。例如一九七六年正科生（full-time students）新生名額有五十九萬七千五百個，但報名的人則有一千五百萬。換言之，三個報名的只有一個能被錄取。其餘三分之二的青年，有些人找不到工作或不願接受低下的工作，則往往變成蘇聯官方所稱的「寄生蟲」、花花大少、無業遊民甚至少年犯。

4. 經濟層面

青年對物質的追求和向上爬升的慾望，對蘇聯政府可能造成的問題有二：(1)蘇聯社會中間階級的職位固然隨着工業化而增加，但仍有一定的限度。根據「一九七四年蘇聯國民經濟」的統計數子，「具有高等和中等專科教育的專家」在一九五〇年時有三百三十萬人，到一九七四年增加為二千一百四十萬人（不包括軍人、退休人員和學生）。換言之，中間階級佔勞動人口的比例，由百分之五增加到百分之十八^④。中學畢業生願意工作的，則只有淪為工、農階級或低收入的知識階層，他們的挫折和不滿是可以預期的。以工人為例，一九六六年在列寧格勒所做的一項工人態度調查顯示，工人對工作有相當的不滿（見表二）。三十歲以下的不滿程度很明顯的高，只有百分之五十多一點的被調查者對工作的一般情況表示滿意；而三十歲以上的也有百分之四十的人顯然對工作不滿意。參與此項調查的工作者之一——雅多夫（V. Yadov）對三十歲以下的這批青年工人有更詳細的分類。他發現其中只有百分之十六點七的人完全滿意，百分之二十四點六的人滿意之處多過不滿意者，其餘的百分之五十八點七則分別是不滿意的，或者不滿意之處多於滿意者，或者是無明確意見者^⑤。蘇聯社會生活水準越提高，工人的「疏離感」越重，他們感到中間階級受惠的程度超過應有的比例。自一九五〇年代以來，工人階級對中間階級越來越懷疑，對統治者也越敵視。偶而他們會訴

註② 註③ 註④ 註⑤

② 註③ 註④ 註⑤

② Paul Hollander, ed., *American and Soviet Society*, (New Jersey,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Inc., 1969), pp. 374-5.

③ 註④ 註⑤

④ 註⑤

⑤ 註⑥

⑥ 註⑦

⑦ 註⑧

⑧ 註⑨

⑨ 註⑩

表二：對工作的滿意，按年齡分類

(百分比)

滿意於	30歲以下者	30歲以上者
工作的一般狀況	51.1	60.0
工資數目	34.0	46.3
工作內容	58.2	59.0

來源：A. G. Zdravomyslov et al., eds., *Man and His Work*, White Plain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Arts & Science Press, 1970, p. 132, as cited in Zev Katz, "Sociology in the Soviet Union," *Problems of Communism*, 20 (May-June 1971), p. 33.

諸「罷工」來表達他們的積怨^②。(2)蘇聯政府所著重的生產目標，仍然以與國防有關的重型工業為優先，無意滿足青年「增高的物質慾望」，因此便要對「消費主義」進行批評。布里茲涅夫在蘇共二十大中說：「我國也有那種人，力求少給國家，而更多的得自國家。正是在這種心理上，表現了利己主義和市儈習氣，蓄意發財致富，對於人民的事業漠不關心。為社會、家庭帶來很大損失的酗酒，公開的說，仍舊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像是和布魯批評相呼應，契布利科夫也說，西方無線電臺所傳播的一些顛覆思想正得到部份蘇聯青年的反響；一些蘇聯青年男女受消費主義、自私和崇拜物質等宣傳的影響，對社會主義採否定的態度。至於青年大量離開農村，也造成不良的後果，農村勞力的分佈不均，中亞地區農村人口過剩，而東部和西部西伯利亞及烏拉山地區則嚴重缺乏農村勞力^③。這對農業生產的不利影響同樣不可忽視。

結 論

蘇聯青年對政治的冷漠固然有利於共黨的統治，但優秀的青年遠離政治也有不良的後果。固然蘇聯的政治精英分子，有些是從專業人才吸收而來，但畢竟職業黨工人員是主宰的力量。當這股力量逐漸為一批庸才所充任，他們的決策和執行會冒着更多錯誤的危險，對蘇聯人民，甚至政府可能帶來悲劇性的後果。此外，不像資本主義社會有許多私人經濟部門，在蘇聯，政府是惟一的雇主，有才智的青年能發揮其精力與長處的機會受到限制。而且蘇聯社會又變成一個階層極為分明的社會，在下層的青年如何發泄他們胸中的積怨呢？布里茲涅夫在蘇共二十大中提到，教育「蘇維埃人」要依靠社會、經濟基礎。但蘇聯政府花費龐大的經費於軍用用途，這又如何擴大社會、經濟基礎呢？

(本文作者係本中心助理研究員)

註② 同註①，pp. 17-8.

註③ 同註①，p. 10.